

先秦儒家国家关系
伦理思想研究

王易◎著



线装书局

先秦儒家国家关系
伦理思想研究

王易◎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研究 / 王易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4

ISBN 978-7-80106-673-2

I. 先… II. 王… III.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学—
研究—先秦时代 IV. B82-092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719 号

先秦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研究

著 者: 王 易

责任编辑: 于建平

封面设计: 胡琴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前 言

—

伦理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便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而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规范,赋予了每一个生活于现实的伦理关系中的人以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促使着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生活的稳定。伦理学同时也是一门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涵盖范围不断扩展,学科分支不断细化,尤其是研究的视角不断开阔,逐步突破了以往的时空局限,将整个世界乃至地球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其中,国家关系伦理学就是一门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新兴学科。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个“走向全球伦理”、促成“世界伦理宣言”和普遍伦理的运动方兴未艾。

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The Council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来自全世界120多个宗教团体的6500名代表会聚一堂,通过和发表了德国著名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中文名孔汉思)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s a Global Ethic)这一重要文件。

1995年,在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倡导下,“全球政治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全球是邻居》的报告,建议以“全球性的公民伦理”作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合作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

同的全球性问题的基础。

同年,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领导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创造的差异性》报告,呼吁建立一种“全球伦理”。

1996年,由30位前任政府首脑组成的“互动委员会(Interaction Council)”也呼吁制定一套“全球伦理标准”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探究“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提上议事日程,并于1997年提出“世界伦理计划”;同年的3月份和12月份分别在法国的巴黎和意大利的拿波里举行了两次会议;1998年6月在北京又召开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区域会议,来自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建立全球性“普遍伦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全球伦理”或者“普遍伦理”的提出,其着眼点主要是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说,普遍伦理首先面对的,是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战争带给世界人民的危机与灾难,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组织或者说最高的“伦理实体”——民族国家——对于自身对世界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忽视与践踏。所以,现实的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以及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普遍伦理提出的客观基础,是学者们由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而转化成的学术关切。可以说,对普遍伦理的关注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热点。普遍伦理试图建立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价值原则,以“全球伦理标准”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伦理与以往所有伦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真正地把国际社会纳入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第一次把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的

关系,视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特殊形式来进行考察,在承认国家利益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肯定了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调节。所以,普遍伦理的核心其实就是国家关系伦理。普遍伦理首先和主要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促进国家间的友好相处,引导世界的多元共存,争取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普遍伦理和国家关系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都可对普遍伦理或者说国家关系伦理学作出自己的贡献,正如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所提出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所阐述的,很多基本原则规范是“早已存在于人类各个伟大而古老的宗教与伦理传统之中的”。这里并不需要根本性的创造发明,关键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自身、从自己最深厚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努力发掘和弘扬各民族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人类一些古老和基本的道德常识和直觉重新予以明确的阐述、概括和强调。

二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独特
的历史经验应该为世界未来的和平作出贡献。有人把当今世界比
作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①也有人把中国两千

^① 费孝通先生曾把 20 世纪的人类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参见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炎黄春秋》,1999 年第 3 期。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比作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但是无论如何,都说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的的确与今天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存在很多方面的可比性:^①

1.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它的“村民”被限定在这个地球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以车马为主的交通也使当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加强,由于东面有海,北面有沙漠,西面和南面都有山,使得中国变为一个“中国村”,上百个部落或者诸侯国被围定在这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中国村”里面。

2.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现有的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是经过几千年的分分合合、割据兼并,从原来几百个、上千个国家和部落演变而来的。先秦时期也是如此。春秋战国初期有 100 多个国家,它们是从原来的 900 多个“国家”或者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而到了战国时代,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征战兼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

3. 当今世界上有大国、超级大国、小国、弱国、霸权国,特定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轴心国、同盟国等,有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压迫和保护,有大国在弱小盟国内的驻军。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的“上国”、弱小国、霸主、结盟、盟主等,也有在结盟国内驻军等。

4. 当今世界上有一个联合国,具有合法的、超国家的、最高的权力,但是它主要是行使舆论约束的作用。有时借助大国的军事力量去行使权力,有时也被某些大国所控制和利用,从而沦为大国

^① 参见庞雨《世界政治大趋势——〈联合国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的傀儡和工具。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个超国家的、正统的、合法的权力机构,它就是周王室。周王室实际上也只有名义上的地位和作用,当时的霸主经常“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5. 当今世界有坦克、飞机、导弹、潜水艇等战斗武器,有生物战、化学战等手段。而春秋战国时期则有快速战车、带装甲的钝车、战船,有步兵、骑兵、水兵,也经常采用投毒、布阵等作战方式。

6. 不仅所发生的事件相像,事件所发生的时间顺序也相同。当今世界曾发生过殖民与独立战争,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对立和冷战后期的裁军谈判;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当前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则发生过由多个诸侯国参与的世界大战——鄢陵之战和城濮之战;有两个“超级大国”——晋国和楚国的长期对立;然后也出现了和谈和裁军会议——“弭兵盟会”;然后是一个“霸权国家”——晋国的解体,晋国先是一分为六,后又合并为三;另一个“超级大国”——楚国试图主宰世界;随着楚国的衰落,“多极化”的新局面——战国七雄出现。

可见,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着。但是,把当时的“中国村”与现在的“地球村”进行类比和对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换一个视角,重新研究中国在先秦时期的历史,以及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去审视儒学,或许会为当前的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以及国际关系的协调提供借鉴。同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排除内外干扰,独立自主、坚定而又稳

妥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事情。“温故而知新”,回顾和总结春秋战国时代丰富多采的国家关系、研究儒家“以和为贵”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与实践,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

将文化因素、伦理道德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但是国际关系理论若不涉及文化,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解释便缺乏深度。当今中国外交的特色,也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探寻其根源。

和谐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①两千多年来,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后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关于修身养性、和谐人际关系和为政治国等方面,而对于儒学所蕴含的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理论却很少注意,对于重义轻利、德威并重、和而不同等原则在国家关系上的作用则缺乏深入的发掘。其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文化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在先秦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礼记》、《尚书》、《左传》、《国语》等以及《战国策》、《老子》、《孙子》、《墨子》、《庄子》、《商君书》、《晏子春秋》、《鬼谷子》等书中,有关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论述是很多的。孔、孟、荀与道、墨、法、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211~2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纵横诸家的争鸣与论战,以及他们周游列国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很多都与国家关系密切相关。孟子就曾明确提出过“交邻国之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在历史上创造多民族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封建统一王朝在历史上与周边民族国家“亲仁善邻”的外交友好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儒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从国家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学更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其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外交理论的创造与实践,从而使我国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在新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外交思想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最光辉、最著名的范例。它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应当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决不开第一枪”、求同存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等,都“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①。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性质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与儒家所倡导的为政以德、交国以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在新形势下,随着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祈愿。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与宽容精神必将与之相辅相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特点,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对于正确解释、分析乃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7~3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至预测中国外交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是西方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中国外交的薄弱环节之所在,而正是中国学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文化优势与潜力的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存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人际间、国际间、民族间应当如何相处,仍然是一个十分现实、十分迫切的问题。天下仍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由意识形态、宗教、领土和民族矛盾引发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军备竞赛、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恶化等跨国问题愈益严重,这些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威胁着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解决或者缓解全世界面临的这些共同问题,单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它需要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与共同协作。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技术层面,更涉及伦理层面;不仅涉及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如何对待,更涉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并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面对。为了人类的前途与幸福,重温古老儒学的箴言或许是有益的。儒家追求“天下一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等等。这些思想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国家利己主义,有助于摒弃各种各样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在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尽量想到个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与责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考虑到促进他人的发展;在谋求自己国家和民族繁荣的同时,照顾到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尽可能地通过斡旋、谈判等和平方式而不是诉

诸武力的手段解决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人际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其他国际争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果真如此,就必然会使人类变得更高尚、更文明,使社会变得更和谐、更有序,使发展变得更协调、更均衡。人类已经跨入 21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总之,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地球村”的发展与繁荣,是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大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将日益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其影响力,儒家文化所独有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应该能够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学中丰富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妥善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and 模式。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必将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历史的现实——先秦国家与国家关系·····	1
第一节 诸侯国·····	1
第二节 诸侯国家关系·····	7
第三节 道德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	13
第二章 思想的建构——先秦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 理论基础 ·····	19
第一节 天下观 ·····	19
第二节 人伦观 ·····	27
第三节 正统观 ·····	38
第四节 和谐观 ·····	50
第三章 协和万邦——先秦儒家外交伦理思想 ·····	60
第一节 以义制利 ·····	60
第二节 注重诚信 ·····	66
第三节 德威并用 ·····	69
第四节 交邻之道 ·····	71
第五节 使者之道 ·····	75

第四章	禁残止暴——先秦儒家战争伦理思想	84
第一节	王道与霸道	84
第二节	有道与无道	89
第三节	用兵与壹民	96
第四节	不战而胜	98
第五章	辨析与升华——与诸家思想的比较	104
第一节	兼爱非攻 有齐无畸——墨家	104
第二节	贵己为我 全性保真——杨朱	111
第三节	小国寡民 谦下柔顺——道家	114
第四节	折冲樽俎 纵横捭阖——纵横家	119
第五节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兵家	125
第六节	富国强兵 以力服人——法家	128
第六章	古为今用——中国与世界的需要	139
第一节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140
第二节	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152
第三节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思想渊源	159
第四节	和谐世界的构建:时代背景与战略选择	183
余 论		195
第一节	中国不存在威胁——驳“中国威胁论”	195
第二节	文明并非必然冲突——驳“文明冲突论”	199
中英文摘要		209
参考书目		231

第一章 历史的现实——先秦国家 与国家关系

第一节 诸侯国

按照历来的王统观念,自西周以至东周的整个先秦时期,只有一个国家——周,各诸侯国都由周天子来分封,统统臣属于周室,不能算作独立的国家;并且在周朝天子所统辖的范围内,老百姓都属于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由周王朝一统天下。

但历史的事实却是,大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这种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的局面就已成为一种怀旧的梦想和文学语言的描述了。周朝国家的统治在西周末年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首先,在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出现了矛盾激化的现象。如《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曾“烹齐哀公于鼎”(《太平御览》卷八五皇王部引);周厉王时,又发生“万民”将厉王流居于彘^①的事件,这对周王室的统治无疑是极大的震动,而且在周朝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周朝国家与外族以及受其控制的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周宣王时,周朝就连年对异族用兵,并常遭失败。周幽王在位末年,因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宜臼舅家的申国

^① 今山西霍州东北。

便联合缙国和西夷犬戎攻打周,并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申侯与其他诸侯国君共立宜臼为天子,这就是周平王。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西周宣告结束,历史进入东周的春秋(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战国(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221 年)时期。

东周初年,也就是自周王室东迁至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近 50 年中,周王室对周朝国家仍有相当的控制权。^①这时,受周朝国家控制的主要诸侯国有晋、宋、卫、齐、鲁、陈、蔡、郑等。但是不久,在周朝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便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即少数诸侯国开始凭借本国的实力谋求对其他诸侯国的控制权,以及相对于周王室的更大的自治权。郑庄公在位时的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显露出这种霸权政治倾向的诸侯国,郑国当时曾与周桓王的军队交战,并使王室的军队战败。

郑国衰落之后,齐国代之而起。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增强国力的改革措施。前 681 年,齐国邀宋、陈、蔡、邾等国国君在北杏^②会盟,平定宋国内乱,并灭遂国,这是齐桓公谋求霸权的开始。次年,齐桓公又邀集陈、曹两国伐宋,并向周王室请派王师,使宋国屈服,揭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序幕。前 651 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③,与盟的有鲁、宋、郑、卫等国,周王也派代表参加。这次会盟,标志着齐桓公终于成为周朝各诸侯国的霸主,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原属周王室所有的中央控制权。

在齐桓公之后陆续出现占据霸主地位的主要诸侯国先后有晋文公时的晋国,秦穆公时的秦国、楚庄王时的楚国,之后晋、楚两国

① 童书业《春秋史》,第 112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② 今山东省聊城东。

③ 今河南省兰考。

为争夺霸权长期进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较量。春秋晚期，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吴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率领吴国大败楚国、征服越国，并大举北上先后战胜鲁国、齐国等中原大国，于前 482 年取得霸主地位。但至公元前 473 年（此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吴国被卧薪尝胆的越国攻灭，越国国君勾践亦北上会晋、齐等国于徐州^①，成为春秋霸权政治发展中最后一个有势力的霸主。

春秋时期霸权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周王室作为中央权力代表的作用已经是非常不稳定的和极其有限的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几近丧失。到了春秋末年，周王室控制的地区只相当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仅在名分上还保留着周朝国家最高权力者的地位。

战国初年，魏国由于李悝的变法逐渐成为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公元前 344 年，魏惠王称王，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第一个称王的事例，它标志着春秋时期在形式上尚被承认的周王室的最高权力者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诸侯国实际上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没有最高权力制约的分裂时期（这种分裂本身就是周王朝崩溃的反映）。后来，秦国、齐国、韩国、赵国、燕国等诸侯国的君主也都先后称王（楚国在春秋时就已称王）。称王之后的各诸侯国，其独立性与自治性急剧增长，它们纷纷各自为政，互相兼并、争霸，根本就不把周天子本应行使的权力放在眼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以夺取别国的领土乃至吞并别国为最终目的，而不再仅仅象春秋时期那样以争得对他国的控制权为满足。诸侯国的霸权争夺更充分证明了周王室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形式已不再适用，周天子的统治则完全没落，很少有迹象表明

^① 今山东省滕州南。